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文心雕龙·辨骚》之“辨”义 及其思想渊源

陈允锋

【提要】《辨骚》篇属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辨”与“辩”通，意在辨析与楚骚直接相关的若干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辨“师范屈宋”之正途，救“效骚命篇”之讹势；二是辨楚骚参酌古今、自铸伟辞之特质，明其渊源所自，作为执正驭奇、通变创新之轨则；三是辨汉世楚骚品评之偏颇，以“四同四异”力驳“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之论，为客观、合理地评价楚骚之双重特性，奠定了必要的认识基础。此外，刘勰身处魏晋子学一度复兴之后，《文心雕龙》取资于先秦诸子“飞辩”之术，而墨家辩学之传统，对《辨骚》篇影响尤为明显。

【关键词】刘勰 《辨骚》 问题意识 辨析方法 先秦诸子 辩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2-0079-10

《辨骚》篇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据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言，《辨骚》属于“文之枢纽”部分，其宗旨是讨论如何以楚骚为范例、创新求变，故曰“变乎骚”。刘勰的思路与立意，原本颇为明确。但是，刘勰因何而“辨”？以“骚”命篇是否足以涵括《楚辞》？《辨骚》篇与“文之枢纽”的前四篇、“论文叙笔”以及“剖情析采”部分的关系究竟如何？篇中所列楚骚与雅颂“四同四异”的理论要旨应当如何理解？可谓歧解纷出，莫衷一是。^① 这些讨论与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辨骚》篇以及《文心雕龙》整体文论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辨骚》篇自身内涵之丰富性与复杂性。本文重点从刘勰的问题意识及其解决方法这一角度切入，分析《辨骚》之“辨”所涵括之内容，并探究其思想渊源。

一、悬轡以驭楚篇：辨师法楚骚之正途

《文心雕龙》是一部充满问题意识的文论巨著。唐人刘知几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② 可见，“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文评准的无依，乃刘勰撰著《文心雕龙》之重要原因。若从《序志》篇看，则

① 参见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463~464页。

② 刘知几：《自叙》，《史通》卷10，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刘勰之问题意识,远不止“人相倚摭”一端。比如,刘勰首先从文章与生命价值关系的角度提出,“君子处世”,唯有凭借“智术”,“制作”立言,才有可能实现“拔萃出类”、“腾声飞实”的人生目标。^①这是从解决人生问题的层面,申说《文心雕龙》撰著之缘由;《序志》赞语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作结,立意殆即在此。又如,刘勰还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的角度,指出“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之文坛陋习所带来的“将遂讹滥”之弊端,倡导“贵乎体要”、“恶乎异端”的写作主张。这是针对“离本弥甚”之文坛现状而提出的疗救之方。此外,刘勰又考察了“近代之论文者”,并逐一诤评,总括其病:一则曰“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另一则曰“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解决之道无他,唯在“述先哲之诒”,以“益后生之虑”。凡此种种,无不浸染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辨骚》篇同样集中体现了这种直面问题、追根溯源的探究精神。

关于刘勰《辨骚》之“辨”义,纪昀曾如是阐释:“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②从《文心雕龙》全书对待楚骚的态度来看,此说颇有道理。因为刘勰确实注意到楚骚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通变》篇曰:“汉之赋颂,影写楚世。”就明确指出汉代之赋颂,乃继踵于楚辞。《时序》篇亦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问题在于,刘勰认为汉代作家在“师范屈宋”的过程中,多倾力于艳丽辞藻之经营,而忽略了文质相称之要义,自然易滋流弊。《才略》篇就指出:“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理不胜辞”、“文丽用寡”,就是片面发展楚骚“夸艳”特点的必然结果。《通变》篇以为“楚汉侈而艳”,原因也在于此。作家择取某类前代作品为范本,必然影响其文章体貌风格,故《定势》篇谈及“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而“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若一味追求“艳逸之华”,不顾楚骚之情气内质,剑走偏锋,难免误入歧途。具体而论,则如《夸饰》篇所言:“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物色》篇则从另一角度涉及同类问题:“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在《辨骚》篇中,刘勰既认识到楚骚自身的复杂性,也看到了后人效仿楚骚之弊端:“自九怀以下,遽躐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怆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刘勰看来,楚骚既有“叙情怨”、“述离居”之充实内质,又有“论山水”、“言节候”之要素。但是,后人仅止于“躐其迹”,取其“表”而遗其“里”,汉世卓荦者如枚、贾、马、扬诸家,亦不过“追风入丽”,或“沿波得奇”。即此而论,其确实无法与屈宋之“逸步”并驾齐驱,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家皆《通变》篇所言:“竞今疏古”、“近附而远疏”;虽然得楚骚之“风”、“波”,却未识其根源,终究落于“莫之能追”的境地。论其具体表现,则如刘勰所言:“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察、分析与判断,刘勰提出了效法屈骚之正途:“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酌取楚骚之“奇”、

① 本文所引《文心雕龙》文字,均依据周振甫注释本,为避繁复,下不出注。参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华”而不失其“贞”、“实”。因此，刘勰之“辨骚”，确如纪昀所云，注意到了汉代以还“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这一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勰“辨骚”之目的，乃示人如何更好地“悬轡以馭楚篇”——楚篇是杰出优秀的，但善学者能自如“馭”之，驰骋于通衢而卓然成家；不善学者偏攻一端，务华弃实，奇则奇矣，艳亦有之，然而，倘若因此而“失其贞”、“坠其实”，则难逃“诡滥愈甚”之讥。因此，刘勰之“辨骚”，乃立足于楚骚华实并茂、奇贞兼具之特点，辨明“效骚命篇”之正途，力挽后学“追风入丽”、“沿波得奇”之讹势。这显然是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的不得不“辨”之理。

二、体宪三代，风杂战国：辨楚骚参酌古今、自铸伟辞之特质

《辨骚》之“辨”，其问题意识及其所涉及之内容，又限于上文所论，即不止于纪昀所谓“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对楚骚之渊源有所辨析。《序志》篇强调，文章写作理论应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在《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使就《辨骚》篇而论，也很好地贯彻了这种重“根”贵“源”的思想与方法。因为只有深入挖掘问题之“根”、“源”，才有助于更好地树立通“经”创“变”之楷式，疗救文坛末学之通病。刘勰在《序志》篇指出，后人立言为文的主要问题之一，乃在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由此导致“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诸讹滥乱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辨骚》篇中高度推崇楚骚，以为“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而原因之一，就在于屈原的时代“去圣未远”，故能“体宪三代”、“取镕经意”，得“衔华佩实”之要旨。刘勰如此评价楚骚，与其文章本源于“经”这一认识直接相关。《序志》篇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宗经》篇更具体地提出，经典“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运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后代之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铭诔箴祝等文章众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此即该篇赞语所言，经典乃“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具体到楚骚之渊源，刘勰《通变》篇言：“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比兴》篇也指出：“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风兼比兴。”因此，后人习文，欲得楚骚之真髓，必向上一路，如屈宋一样，师圣宗经，“取镕经意”。^①而后人“师范屈宋”之失，正在于徒袭楚骚之丽辞夸饰而罔顾“依诗制骚”、“取镕经意”之根本。《比兴》篇认为“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就说明了这一点。《辨骚》篇则从正面立论，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馭楚篇”，实质上已经包含着对“楚篇”与“雅颂”之源流关系的自觉认识。因为在刘勰看来，楚骚之能臻于“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之佳境，与作家“取镕经意”、“体宪三代”息息相关。

《辨骚》虽以“辨”命篇，其宗旨则如《序志》所言“变乎骚”。此所谓“变”，即《通变》之“变”。故《辨骚》本与《通变》相呼应。譬如前文所论楚骚“取镕经意”、“体宪三代”之特点，相当于《通变》“体必资于故实”、“参古定法”之事；而《通变》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以及“望今制奇”之论，则相当于《辨骚》“风杂于战国”之说。因此，刘勰辨楚骚之根源，除了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楚骚与经典之关系，同时也兼顾时代风尚之影响。对于这一点，《时序》篇言之甚详：“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正因

① 《文心雕龙·诠赋》篇论赋体之渊源，也是诗、骚并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赞曰：“赋自诗出，分枝异派。”既然赋体原本于经典之“六义”，此乃赋体之远源，则赋家之作，不宜止于“影写楚世”，还应当效法雅颂之“六义”。

为楚骚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之政治文化土壤，所以又具备了与经典不尽一致的独特风貌。这实际上也就阐明了楚骚“自铸伟辞”的又一重要缘由。由此可见，刘勰之“辨骚”，既涉及楚骚如何“参古定法”——源于“三代”之“经意”，又兼及楚骚如何“望今制奇”——“惊采绝艳”之美乃根植于战国纵横之风气。刘勰斟酌古今之“辨”的重要目的之一，乃在于引导后人明确楚骚渊源所自，作为执正驭奇、通变创新之轨则。

三、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辨汉世楚骚品评之偏颇

以上种种，具体内容或有不同，然皆不出写作实践这一范畴。换言之，无论是辨楚骚“奇文郁起”之渊源、背景，还是辨汉代赋颂“影写楚世”之弊端，都侧重于具体的文章写作活动层面。但是，正如刘勰在《序志》篇中既讨论“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写作倾向问题，又兼及“近代论文者”的理论缺陷问题一样，《辨骚》篇所欲明辨的，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对前代楚骚评论的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最能直接体现《辨骚》篇的问题意识。

正如《原道》《情采》《知音》篇一样，《辨骚》篇也是以赞叹语为开端的：“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但是，紧接着的，并非刘勰对楚骚的具体剖析，而是对汉代相关评论的转述：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驱虬乘鹭，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这一部分内容，相当于今人所谓的文献综述部分，列举出诸家的主要观点。刘勰将以上观点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淮南王刘安、扬雄、汉宣帝以及王逸为代表的“皆合经术”说；另一类是以班固为代表的骚“不合传”说。刘勰指出，无论是“举以方经”者，还是“谓不合传”者，都存在“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之弊。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鉴而弗精，玩而未核”。为了说明这一点，刘勰采取的办法是“征言”、“核论”，即下文提出的“四同四异”说：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从章法结构的角度而论，此“四同四异”既然意在“核其论”——刘安、班固等论家之观点，其主要功用，乃在于“破”：以“同于风雅”之“四事”，破班固“谓不合传”之论；又以“异乎经典”

之“四事”，破刘安、王逸等“举以方经”之说。^①因为楚骚有“同于风雅”之“四事”，所以说“论其典诰则如彼”；由于楚骚另有“异乎经典”之“四事”，所以说“语其夸诞则如此”。由此可见，尊之者谓其“皆合经术”，贬之者谓其“不合传”，或抑或扬，皆不尽符合客观实际。刘勰以为两类论家各执一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确能洞悉其弊。所谓“固知”云云，意指由“四同四异”得知楚辞固有之面目——既有“典诰如彼”的一面，又有“夸诞如此”的一面。“四同四异”所征之言，呈其“核论”之效，刘勰的正面主张亦随之而立：“观其骨鯁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说明楚骚既有“体宪于三代”、“取镕经意”的一面，又有“风杂于战国”、“自铸伟辞”的一面。二者结合，相得益彰，取得了“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的巨大成就。至此，《辨骚》篇开端之赞叹语意，得到了回应与强化——“气往轹古”一语，呼应“轩翥诗人之后”；“辞来切今”一语，^② 呼应“奋飞辞家之前”。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刘勰评析楚骚之思路，并结合《文心雕龙》全书之思维，可以看出其立论方法的特点有三：一是如《序志》篇所言，“唯务折衷”，对于前贤论点，不苟同，亦不苟异，而是依据客观之“势”、“理”，如实论析。二是如《知音》篇所言，贵“博观”以“圆照”——不以经典作为唯一的观察视角或评判标准，而是多方考量，纵横相参，前后观照：“轩翥诗人之后”、“去圣未远”、“体宪于三代”、“取镕经意”乃至“气往轹古”云云，都是从楚骚与前代经典之关系角度立论的；而“奋飞辞家之前”、“辞来切今”，则是从楚骚与后代辞赋之关系角度着眼的；至于“楚人多才”、“风杂于战国”云云，又侧重就楚骚与楚地文才之盛以及时代风尚之关系角度立说。因此，如果说汉代刘安、王逸、班固等更倾向于以经学“一维”之眼光论楚骚之高下，那么，刘勰则综观“三维”而成“圆照”之思。^③ 三是核论征言之求实精神，“四同四异”说即其具体之表现。^④

四、“辨骚”即“辩骚”：刘勰与先秦辩学传统之关系

刘勰能在“辨骚”过程中超越前贤而入于理论新境，固然与唯务折衷、博观圆照以及核论征言诸法直接相关，但同时也得益于《文心雕龙》所汲取的先秦诸子尚“辩”之思想传统。刘勰《辨骚》之“辨”，一作“辩”，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辨骚》谓：“元刻本‘辨’作‘辩’。《校证》：‘汪本、余本、张之象本、两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钟本、梁本、王谟本、《四库》本、崇文本

① 冯春田曾经指出：“刘勰称《楚辞》之文为‘《雅》《颂》之博徒’究竟是什么涵义……汉宣帝说‘辞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与孔子言《诗》同义……所以刘勰本篇说‘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另外汉宣帝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而‘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比倡优、博弈贤得多）’。但是刘勰认为这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他分析总结出《楚辞》‘同于《风》《雅》者’四事和‘异乎经典者’四事，即立足于同《诗》的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同、异。这便否定了前人对《楚辞》的任意的‘褒贬’和失实的‘抑扬’，而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对汉宣帝以为《楚辞》‘皆合经术’之说的否定。在这里，刘勰又巧妙地借用了汉宣帝称辞赋‘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话，反过来称《楚辞》为‘《雅》《颂》之博徒’。所以，刘勰称《楚辞》为‘《雅》《颂》之博徒’，是针对汉宣帝谈辞赋认为‘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话而发。‘博徒’即汉宣帝语‘倡优博弈’的所指。”参见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按，汉宣帝是在评议“辞赋”价值时，提及“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原本并非针对楚骚；因此，刘勰所说“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究竟何所指，尚有待进一步考辨。不过，将“《雅》《颂》之博徒”与汉宣帝“贤于倡优博弈”联系起来理解，视“博徒”之喻为否定前人说法的理论手段与工具，倒不失为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

② 对于刘勰“辞来切今”说之义理，学界理解不一。罗宗强先生《释“辞来切今”》一文详加辨析，其说可从：“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切’字的习惯用法，从他对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看法，从他对声律、丽辞等的看法，也从他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盾看，将‘辞来切今’的‘切’，释为‘切合’，意谓文辞之来，切合于今，似更合于彦和之本意”。参见罗宗强：《读文心雕龙手记》，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2页。

③ 许学夷《诗源辩体》曰：“淮南王、宣帝、杨雄、王逸皆举以方经，而班固独深贬之，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也。”参见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④ 参见陈允锋：《阅时取证，核论徵言：〈文心雕龙〉的实证方法及求实精神》，《〈文心雕龙〉疑思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页。

“辨”作“辩”。”^① 桥川时雄指出：“《楚辞》及各本作‘辨’，唐写本作‘辩’……汪、张、余、胡及《四库》本作‘辩’。《说文》辩部：辩，治也。段注云：俗多与辨不别。时按辩、辨二字同音义近、非关假借，通用已久。”^② 可见“辨”与“辩”通。而“辨（辩）骚”之“辨（辩）”，与“文之枢纽”的前四篇篇名之“原”、“征”、“宗”、“正”词性相同，皆为动词，具有方法论意味。而《文心雕龙·论说》篇谓：“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诸子》篇则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如果说《文心雕龙》全书重点在“博明”为文立言之“万事”，《辨骚》则倾力讨论执正驭奇、通古达今的创变之道，属于“适辨一理”之“论”，同样具有“辨正然否”的目的与功用。其实，“博明万事”之“子”，立说基础之一，也正是“辨”（辩）；而“适辨一理”之“论”，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明”理。《文心雕龙》是一部善“辨”之作，《辨骚》又以“辨（辩）”命篇，其渊源皆与先秦诸子辩学思想传统密切相关。

先秦诸子多善辩者。《诸子》篇曰：“逮及七国力政，俊义蜂起。孟轲膺儒以磐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并飞辩以驰术，履禄而馀荣矣。”其中孟子以“好辩”著称，刘勰《序志》篇即引用其成辞，自陈《文心雕龙》撰著之动因——“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可知因“辩”而立言，本是刘勰《文心雕龙》的重要特点之一。《诸子》篇赞语总结篇章要旨，又有“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之说，亦可见刘勰颇为推崇先秦诸子之“辩”术。其中“辨雕万物”一语，乃《庄子·天道》篇成辞，“辨”原作“辩”：“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③ 庄子一派崇尚自然华采、无言之“辩”，刘勰亦自觉参酌而用之，故《情采》篇复加征引，以为“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这或许有助于说明刘勰如何从先秦诸子“飞辩”之“术”中汲取思想资源。

在先秦诸子中，尤以墨家论“辩”最为详尽。^④ 刘勰《辨骚》之“辨”，若从思想方法上来看，则与墨家学说最为近似。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因“争彼”而“辩”。墨家不仅擅长辩术，且对“辩”之特点、方法、效用，有颇多思考、总结。^⑤ 《墨子·耕柱》篇载：“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⑥ 所谓“能谈辩者谈辩”，讲的就是对于“辩”术之研究。^⑦ 墨家认为，“辩”之为义，贵在“争彼”。《墨子·经上》云：“攸（彼）不可，两不可也……辩，争彼也。”^⑧ 《经说上》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

①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② 转引自《文心雕龙义证》上册，第132~133页。

③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卷5，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5页。

④ 方授楚以为：“墨家辩学之成就，终在各家以上，非儒道法名诸家所能望者。”参见方授楚：《墨学源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4页。引文重点号为原书作者所加，兹照录。

⑤ 参见《墨学源流》，第186~190页。

⑥ 孙诒让注：《墨子间诂》卷11，《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57页。

⑦ 《先秦逻辑史》指出：“墨子最先提出了‘辩’的概念，并初步揭示了‘辩’的目的和作用……由于墨子深知‘辩’的作用，因而十分尊重懂辩术的人，他认为凡属贤良之士都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上》）……墨子还第一次提出要把‘谈辩’作为实行义政中不可缺少的专门职业和技术，提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这里的‘辩’就与‘辨’不同义，而是指一种论辩之术了。这对辩术的发展，对辩学逻辑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参见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0页。

⑧ 《墨子间诂》卷10，《诸子集成》第4册，第193页。

俱当。”^① 胡适解释说：“墨家的‘辩’，是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经上》说：‘辩，争彼也……’‘争彼’的‘彼’字，当是‘彼’字之误……彼字与‘诤’通。《说文》：‘诤，辩论也。古文以为颇字。从言，皮声。’诤、颇、彼，皆同声相假借……现在的‘辩驳’，就是古文的‘争彼’。先有一个是非意见不同，一个说是，一个说非，便‘争彼’起来了。怎样分别是非的方法，便叫作‘辩’。”^② 张岱年也指出：“所谓辩，即‘争彼’之义；所谓‘彼’，则是‘不可’之义。两方互谓不可，谓之争彼。对于一事，此认为是，彼认为非，便是争彼。”^③ 刘勰《辨骚》之方法正与此相类似。刘勰之前，刘安、扬雄、汉宣帝和王逸等皆认为屈原《离骚》合乎经术，而班固则“谓不合传”。这就出现了“此认为是，彼认为非”的局面。刘勰之“辨骚”，首先要面对与处理的问题，就是两汉之世楚骚评价之争。刘勰不仅看到了这种因同一评论对象而引发的截然相反的意见，而且在理论层面予以总结，认为争论双方各有偏颇，都存在“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之弊，因为双方都属于“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为了解决前代遗留的学术争议，刘勰提出了“将核其论，必征言焉”的具体方法，意在说明：无论褒扬也好，贬抑也罢，均为“过实”之论。按照《墨子·小取》篇的表述，“辩”之功能，贵在“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④ 所谓“明是非之分”、“察名实之理”以“决嫌疑”，即刘勰所谓“核其论”者；而“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及“以类取，以类予”云云，则相当于刘勰“征言”之事，也就是援引具体论据、阐述相关理由。总之，刘勰之“辨骚”，与墨家“争彼”之“辩”相关，都是基于“是非意见不同”这一现象而展开的。因此，刘勰之“辨”与墨家之“辩”一样，皆始于“问题”且因“问题”而“辩”。

另一方面，为“异同”而“辩”。墨家之“辩”学，颇重“同异之辩”。《墨子·经说下》曰：“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⑤ 这阐明了“同异之辩”的具体内涵，体现了理论方法之自觉。墨家又论同异之类型，《墨子·经上》曰：“同：重、体、合、类……异：二、不体、不合、不类。同，异而俱于之一也。”^⑥ 可见其辨析之细致。晋人鲁胜注《墨辩》，即把“辩同异”视作墨家辩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名者所以别同异……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⑦ 胡适也指出，墨家讨论“同异之辩”颇为详细，因为“名学一切推论，全靠同异两事”；^⑧ 在墨家所论“或、假、效、辟、侔、援、推”等七种“辩”术中，“‘推’最为重要”，因为“推”是“由个体推知通则”，属于“归纳的论辩”，“《墨辩》论归纳法，只有（一）同、（二）异、（三）同异交得三法”。^⑨

就《文心雕龙》而言，《辨骚》篇提出“四同四异”之论据，显然体现了《序志》篇“唯务折衷”的精神。这除了体现为重视客观之“势”、“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善用“同异”比观之法。《序志》篇提出“折衷”原则，就运用了“同、异”这一相对之概念：

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作“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兹从方授楚《墨学源流》所引文字及断句，参见该书第187页。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9页。

④ 《墨子间诂》卷11，《诸子集成》第4册，第251页。

⑤ 《墨子间诂》卷10，《诸子集成》第4册，第224页。

⑥ 《墨子间诂》卷10，《诸子集成》第4册，第194页。

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33~2434页。

⑧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60页。

⑨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85页。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纵观《文心雕龙》全书，常见“同异”之辨，这是刘勰品列成文、擘肌分理的重要理论工具。试列举如次：

《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诠赋》：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

《铭箴》：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

《史传》：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

《论说》：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

《檄移》：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

《议对》：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通变》：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声律》：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章句》：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丽辞》：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魏晋以来，才性之辨亦有“同异”、“离合”之论，刘勰论“为文之用心”而施以“同异”比观之法，说明《文心雕龙》与玄学风尚密切相关。然而，先秦墨家论“辩”既详，比观“同异”复为墨学至关重要之“辩”术而影响深广。西晋鲁胜《墨辩注·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①可见，在“别同异”这一点上，墨家之学虽屡受攻难，但非毁者所言“辩言正辞”之法既“与墨同”，亦“不能易其论”。胡适指出：“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那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②关于刘勰在《诸子》篇中列举的“洽闻之士，宜撮纲要”的若干研习对象，“意显而语质”的墨家著作也是其中之一。这说明刘勰不仅重视墨家思想传统，而且深知墨学立言之特质，自然包括以比观“异同”为基础的“辩”术。《文心雕龙》参酌、采择而用之，本在情理之中。

刘勰《诸子》篇曰：“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这说明了汉代诸子之学不兴的政治原因，墨家之学亦不能除外。而据桓宽《盐铁论》：“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③可见墨学亦

① 《晋书》卷94，第2433~2434页。按，鲁胜《墨辩注·叙》提到“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对此一问题，后人意见不尽一致。如胡适将惠施、公孙龙视作墨学之一派，称之为“别墨”；但方授楚否定此说：“胡适著《哲学史》，以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列于‘别墨’。梁启超著《墨者及墨学别派》将宋钘，尹文，许行，惠施，公孙龙，魏牟均纳于其中……钱穆之‘《墨子》’……于《中原墨派之新哲学》则仅述‘首倡万物一体论的惠施，创建新心理学的宋钘’二节……此事作俑于胡氏，梁钱二氏则承讹袭谬，而变本加厉者。”参见《墨学源流》，第157~163页。

②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89页。

③ 桓宽：《盐铁论·论诽第二十四》，《诸子集成》第8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7页。

在隳废之列。时至西汉，儒学得以复振，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传统则寝声于主流意识形态领域。^①但物极必反，至汉末魏晋间，包括墨学在内的诸子之学又呈复兴之势。贺昌群指出：“汉末，因内忧外患之严重……在学术思想上，六经章句之学，‘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赞），劳而少功，疑而莫正。于是穷则变，而为之启导其端倪者，则先秦诸子学之复兴也。”^②其间，除了人们关注较多的庄老之学风行于世外，墨家及其相关的刑名之学亦转受时人重视。据贺昌群之考论，“其时刑名墨家之学，变盛极一时，散见于魏晋史传中者甚多”，而“与墨家相连者，为刑名之学……刑名学之重兴，始于曹操之时……后言名理者甚多……大概魏晋间所谓名理者，相当于今之逻辑，亦称论理学，亦即印度之因明，为一称思辨推理之学”。^③这说明墨家之学虽然未必见重于庙堂，但其思想传统、学术薪火却未尝绝熄。比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谓：“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④桓宽《盐铁论》载：“大夫曰……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之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⑤方授楚据此提出：“是在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犹未绝也……司马迁不为墨子立传，仅于《孟荀列传》后，附著二十四字，此诚憾事。然观《序传》（《太史公自序》）云……故传末之二十四字，必迁作《墨子》之传已亡，而为后人所附益，无疑已……盖淮南王安时既有墨者，迁不应如是之疏，以见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⑥而王充《论衡》论及儒、墨之争：“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⑦此处所谓“今墨家非儒”云云，正透露了在王充生活的东汉后期，墨家之学犹存，并与儒家意见相左，故有“二家争论”之事。汉末黄巾之乱，管宁为“避时难，乘桴越海，羁旅辽东三十余年……嘉遁养浩，韬韞儒墨，潜化傍流，畅于殊俗”，^⑧墨学亦其中之一端，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西晋隐士鲁胜，一方面指出“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而“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馀岁，遂亡绝”；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⑨由此可知墨学虽不如儒学那样传承有序，但像《墨辩》一类的墨家经典尚有存世者，并且仍有如鲁胜一类“兴微继绝者”，故墨学及其刑名之术重显世间，亦有其历史必然性。从《诸子》篇看，刘勰颇为推重先秦诸子之独创性，以为“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据《荀子·显学》篇称，儒、墨并为当世之“显学”；而汉末魏晋以来，墨家及其相关的刑名之学又一度盛行于世。刘勰援引墨学“辩”术以擘肌分理、剖情析采，且将之作为“辨骚”之利器，亦时风使然。

五、结语

《文心雕龙》是一部充满问题意识的文论巨著，《辨骚》之“辨”，即从一个具体论题出发体现了

① 方授楚《墨学源流》第九章《墨学之衰微》谓：“及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义，其传授始绝也。”参见《墨学源流》，第209页。

②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页。

③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10~12页。

④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4页。

⑤ 《盐铁论·晁错第八》，《诸子集成》第8册，第9~10页。

⑥ 《墨学源流》，第208~209页。引文重点号为原书作者所加，兹照录。

⑦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注：《论衡注释·薄葬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09~1312页。

⑧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1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9页。

⑨ 《晋书》卷94，第2433~2434页。

这一特点。据上文考察,可知刘勰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与楚骚直接相关的问题:第一,楚骚华实并茂、奇贞兼具,而后人在“师范屈宋”、“效骚命篇”的过程中,多偏于“追风入丽”、“沿波得奇”一端,“遽蹊其迹”而徒得其表;故刘勰之“辨骚”,意在针砭其弊,力挽“竞今疏古”、“诡滥愈甚”之讹势。第二,刘勰之“辨骚”,又多方探析楚骚“气往辄古,辞来切今”特点之成因,博观圆照,涉及楚骚与“体宪三代”、“楚人多才”以及“风杂于战国”等因素之关系,斟酌古今,纵横相参,意在引导后人明辨楚骚渊源所自,作为执正驭奇、通变创新之轨则。第三,刘勰列举汉世评骚诸家成说,认为“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并施以“折衷”之思,核论征言,援引“四同四异”,破“举以方经”、“谓不合传”之“前论”,辩驳有据,其论自立。此外,刘勰身处汉末魏晋子学一度复兴之后,《文心雕龙》取资于先秦诸子“飞辩”之术,而墨家辩学之传统,对《辨骚》篇的影响尤为明显。了解这一点,或有助于从中土固有思想资源的角度,阐释《文心雕龙》思理精密、义贵圆通的文评佳境之成因。

本文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The Meaning of “Bian” and Its Intellectual Origin in “Distinguishing the Li Sao”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hen Yunfeng

Abstract: The chapter “Distinguishing the Li Sao” is the pivot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The meaning of “Bian” (辨, distinguis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character “Bian” (辩, debate). The character “distinguish” is used to distinguish problems of the *Li Sao*. It has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is to distinguish “the right way to learn from Qu Yuan and Song Yu” and to correct the wrong tendency of “emulating the *Li Sao* to compose pieces”. The second is to distinguish the features of Chuci (楚辞, The Songs of Chu), that is, consulting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rms and creating brilliant wor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Chuci origins. The understanding could be used as a principle of “grasping the normal and reining the novel;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and creating the new”. The third aspect is to distinguish the partiality of the Chuci critics in the Han Dynasty, rejecting the discussions of “praising or belittling according to the surface, over depreciating or appreciating the facts” by the theory of “four similarities and four differences”. This lays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ng the dual nature of Chuci objectively. In addition, Liu Xie lived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revival of the learning Pre-Qin thinkers which had been prevalent through the Late Han to Wei and Jin period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often refers to “methods of debate” of Pre-Qin thinkers. The influence of Moist dialectics on “Distinguishing the Li Sao”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Keywords: Liu Xie; “Distinguishing the Li Sao”;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distinguishing methods; Pre-Qin Thinkers; the tradition of debate